

全球化视域与文化的创新共享

◇袁漱寒

人类在每一个时代的进步与发展,都有赖于文化的包容与创新。从世界历史的经验来看,凡是文化相对包容的时代与社会,世界多数处于和平稳定的阶段,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学习、借鉴、支持促使经济走向繁荣,民众生活安定和谐,社会包容开放,充满生命力和创造力。长久以来,外界对中华文化存在一种普遍而有限的认知误区,认为中华文化以自我为天下中心,缺乏对周边文化的尊重与理解,这是一种对中华文化的严重误解。考古学的发现以及历史学的研究成果都表明,中国文化既是多元的,也是多源的,这才是中国文化保持生命力的秘密所在。在人类流动性相对较低的古代社会,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尚且离不开包容的文化环境,而在全球化已经成为时代基本特征的当今世界,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维持单一语境中的自给自足。在文化多元共存与互相交流的时代语境下,这种自给自足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自我设限,甚至画地为牢。从古至今,人类历史上从来不缺乏因文化观念的狭隘而导致文明之间陷入矛盾、冲突,甚至长期战争的案例。发生在近期的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本质上是长期占据优势地位的国家对其他国家及文化缺乏理解、尊重和包容的表现。

一、全球化视域下的文化共生秩序

正如光明背后的阴影,人类历史上与包容文化共生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文明自大病”也一直存在。尽管包容文化是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主流价值,但是单一性、排他性的狭隘文化观也始终有其市场,犹如挥之不去的梦魇,时常掀起不同文明之间的对抗与冲突。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文化之间的交流是平等而双向的,人类历史的发展一再说明,没有哪一种文化可以在封闭僵化的语境中

长盛不衰,也没有哪一种文化总是能够站在人类道德与政治的制高点上对其他国家与民族指手画脚、评头论足。正常的文化对话与交流一定是站在开放包容的立场上进行的,居高临下的姿态不仅不利于文化交流,反而会引发对抗情绪,导致社会矛盾愈加激烈,最终使人类社会陷入巨大灾难。人类历史上这类惨痛教训不可谓不多,值得深刻反思。

进入20世纪,全球化体系的发展已然是不能逆转的历史必然;全球化效应所型塑的现代社会带来了日趋显著的革命性变革,亦即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说的“典范转移”,其内涵包括了思想、哲学、政治、经济、科技、艺术及文化各层面。从功能角度而言,尽管全球化的动能是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但是,从价值层面来看,全球化应该是全球各个区域文化的整合。所以,就如康德的“本体论”所言,全球化的本体特质是由理性功能程序和多样性价值内涵统合而成,是科技与文化的共生、物质与精神的共生,而不是帝国主义形式的机制。在当代科技的革命性变革下,传播技术与运输能力得以快速提升,促成了信息、资源以及生活资料的跨国流动快速而深广。随着二战后全球经济体系及世界市场于焉成型,而且在自由主义的推波助澜下,扩大影响到个人生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最后将归结到整体生活机能的文化内涵。

文化帝国主义与国际关系的新自由主义有着紧密的关系。新自由主义的主张,仍是以国家为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彼此互动形成一个国际性的互赖网络,所形成的体系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因而,文化帝国主义的现象与过程呈现出下列三项特质:边陲国家或非西方文化的国家将被迫接受中心国家所输出的文化产品及文化价值观;拜科技飞

跃发展之赐,近代西方文化得以快速且广泛地传播,对非西方文化的国家及地区进行着强烈的同质化影响;西方文化的国际性流动将侵蚀及动摇各地的本土传统,各地方的信仰体系亦将逐步往中心文化靠拢。然而,科技工具并不是核心国家或西方国家的专利,而且生活的接触及影响也不会是单向流动。过去几十年中,在国际领域内,逆向的文化流动正严厉挑战了文化帝国主义的模型;许多非西方文化也正大量流入西方国家,影响了当地的生活形态及信仰体系。这种现象虽然不能期盼国际性文化交流将走向完全平等的境地,但毫无疑问的是未来时代的全球文化图像将趋向于多元、对话、共生的动态平衡,不再是单元支配的文化体系;这一切应该是全球化的效应所致。

既然全球化是一种整体性、全面性、多元性的机能,那么共生秩序也是由多元性的机能网络所形成,包括传统与现代的共生、各地域文化的共生、经济与生态的共生、科学与文化的共生、物质与精神的共生等。共生思想就是一种流动的多元平衡理论,任何的生存状态都是短期的、对立的、容他的动态平衡;它既包括了主流的核心价值,也保留着非主流的核心价值,更重要的是建构中间领域的空间;所以,共生讲求的是尊重他者生存与独立的调和,而不是融化他者、消蚀他者的自主性。

从生存活动与社会机能的形成来看,个人与他者之间的关系网络,造就了特定时间空间坐标下的社群及文化;其过程是从单一视野下的竞争型对话关系,逐渐走向合作型的对话关系。尽管社群的凝聚作用是建构在面对共同生存挑战的合作型对话,但是合作关系并不意味着融合为一;真正有效且能持续的赞同性对话必须是赞同中仍存在着差异—差异给双方自由的空间,赞同凝聚双方的力量,基本上是和而不同,意味着相互理解、彼此接近、各自调整、自由宽容。

二、“一带一路”建设对文化共享的贡献

文化的开放包容是和谐社会持续发展的前提,也是当代中国能否实现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只有站在开放包容的立场上才能真正理解文化自信的意义与价值。全球化体系内的文化传播是交互流动

的,是发生在一个相互联结、互赖、互动的网络体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文化本身总是带着最原始背景的印记或符号,是一群人在特定时空坐标内生活方式的统称。因而,文化基本上是扎根于地方且具有独特性,其积累和衰亡都必须经历一段够长的时间;文化一旦积累,其内涵将进化,如果走向衰亡也必须被替代。全球化体系内虽然具有全球一体化的领域机能,却必须体现于各地文化的价值内涵,形成异质文化入侵,却又相互调和;透过全球性文化流动的过程,其结果是共生的文化情境存在于各地方所显现的全球体系。

从这一角度进行观察,“一带一路”建设五年来的实践同样是中国为了应对世界格局的迅速变化、适应发展方式转变而提出的“文化倡议”,是在传承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外开放战略的创新发展。1955年的万隆会议,周恩来总理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各国互相尊重主权、互惠互利,在两大阵营针锋相对的冷战阶段,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以和平发展为主线推进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继续向纵深发展,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也由资本输入大国成了资本输出大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带一路”建设对全球化文化体系的贡献在于:

首先,解构了“西方中心论”,助推全球的文化发展进入“再平衡”。任何一种文化在形成初期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正如人类学家所观察到的。在文化不断的碰撞、冲突、融合中,占据优势的文化体系会强化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这种以某一种文化为中心的观念正是对其他文明缺乏了解的证明。“西方中心论”分为三个维度,一是种族主义层面,强调不同种族在文化、智力、道德水平上的差异;二是政治立场与价值观念层面,尽管不再提及种族优劣,但其主旨在于证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统治与扩张的合理性,视西方国家为世界进步的领导者;三是思维方式与话语体系层面,由于此一维度的“西方中心论”建立在思维定式和文化偏见的基础上,其影响比前两个层面更大。而马克思在

建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的过程中揭示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形态的合理性与暂时性,指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资本主义的出现与发展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但并不代表着历史进化的终点。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应该依据自身国情选择发展道路,世界需要在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的基础上实现新的融合。

鼓励“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互惠互利互信、共商共建共赢,尊重各自差异,还原多元世界。过去40年来,世界经济格局与社会发展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内在驱动力在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全球化。包罗万象、错综复杂的全球化并非一个客观中立的过程,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成为一个不断渗透着主观目的的价值场域,以致各种利益诉求不可避免地在这一场域中交流互通、甚至冲突对立,不稳定事件频出,形塑并改变着全球化的面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全球化的问题集中爆发,导致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重新抬头,应该说“全球化”到了一个不得不发生改变“十字路口”,对全球化的审视与反思刻不容缓。

其次,重新定义全球化的概念与范围。近30年来,从来没有哪一个词语像“全球化”一样,在世界范围内被如此高频率、大范围地使用。不同人群对全球化的认识是差异化的,甚至是充满矛盾的。贫富差距、全球变暖、难民问题、互联网、社交网络等都是伴随着全球化的展开而成为推动世界变化的热点。但如果对“全球化”一词进行溯源,不难发现,去除一切附加在“全球化”一词上的其他意义,全球化首先是在新自由主义浪潮下资本积累遭遇周期性经济危机,而寻求技术进步与空间转移实现经济危机的延续发生,也就是所谓“空间出路”与“技术出路”的由来。但是,既然经济全球化是由资本市场规律主导的,本质上是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产生的,因此,全球化并非一种固定的经济形态,而是一种始终在不均衡的状态中发展的趋势。尽管学者们早就意识到“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对世界政治力量的平衡带来的深刻影响,但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全球化的社会后果。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份额只有5%,但到了2015年,这个数字是15%。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2015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保持在30%左右。无论中国在主观上是否有意重塑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但是客观上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经济体的迅速崛起,确实是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事件——这已经是一个既定事实。“一带一路”建设着眼于包容性全球化,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强调相关各国要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

最后,在文化共享的基础上对合作模式的创新。“一带一路”以平等合作、开放共享为基础,强调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寻找利益契合点,不再仅仅满足资本主义规律下生产要素“信马由缰”地扩张与流动需要,而是基于推动经济发展与消除贫困,实现更多地区受益。首先,“一带一路”摒弃冷战思维,拒绝“圈子文化”,是开放包容的国际区域合作网络,不同制度、宗教、文化背景的国家均可参与;其次,“一带一路”不是政府工程,也不停留在政府合作层面,而是一个中国为世界提供的公共服务平台;再次,“一带一路”以战略性项目为抓手,做好顶层设计,稳扎稳打,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最后,“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与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沿海率先现代化等传统战略,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自贸区建设等一系列新战略衔接,有助于解决国内各个区域的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一批新的经济增长极。

三、文化共生思想的超越价值

根据康波周期的理论,自1771年的一个长周期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四个长波,分别是蒸汽及铁路时代、钢铁电力及重工业时代、石油汽车与量产时代以及信息与通信时代。从历史考察,在从二战到现在的这个长周期里,中间虽然有波折,全球化的趋势在美国的主导下的状态是明显的。但是世界范围内

大宗商品价格复苏乏力、通缩压力犹存、制造业继续低迷、金融市场动荡和风险上扬,经济因素之外,新的地缘政治因素和地区冲突加剧、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当选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标志着以往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经济全球化的式微。

经济全球化浪潮与新的智能技术革命正是代表着两个时代的更迭。当世界经济按照原有经济模式发展已经触及“天花板”,现存的问题、未来的挑战与创新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共享发展为全球包容性增长探索中国实践和道路,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体现了古代先哲朴素公平的共享思想。不平等是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社会不平等不但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造成了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甚至宗教冲突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今天的世界经济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需要更加重视如何解决全球性的不平等问题。中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共享发展理念,而共享发展理念之所以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内核,正是中国超越了一己之私,一国之利,肩负起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责任,希望将新兴国家纳入到建设现代化与消除贫困的伟大征程中来,这也是世界经济实现包容性发展的重要体现。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集中体现了“十三五”时期发展思路与发展方向。习近平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在开放中发展的。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不能只靠本民族的力量。只有处于开放交流之中,经常与外界保持经济文化的吐纳关系,才能得到发展,这是历史的规律。”这一讲话点明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五大发展理念的“开放”与40年前的“改革开放”之间的承继与超越。以开放促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之所以能够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回顾历史,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地实施了一系列对外开放战略,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奇迹”。这一时期的开放主要是顺应全球产业转移趋势,吸引外资参与中国的经济建设。新世

纪之初,中国以加入WTO为契机,积极推动国内国际规则接轨,有效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下平稳着陆。对外开放战略对推动国内改革和发展、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带一路”建设语境下的“开放”理念,突破了以往单向的开放战略,或是侧重于经济的某一领域或某些方面,开放内容不全面,开放路径不具体的局限,而是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有机结合的“双向开放”。“一带一路”建设要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真正立足全球思考发展路径、进行资源配置,充分考虑深化改革和开放发展的协调问题,融合沿线不同国家战略的契合点,从而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统筹我国出口和进口、引进来和走出去、全球经济合作和区域合作的最具综合性的国家开放战略。这将对我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推动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创新共享的文化具有自我更生、自我赋能的特质。各种文化将在进化、流动、对话、妥协及兼容的过程中完成共生的秩序;既要对自我的历史文化深刻解读,也要发挥面向未来的智慧,以多元文化融入传统文化而共生,以创生新的文化内涵。新的时代前景必然透过新的全球秩序来重构,全球体系中的主流成分或非主流成分都必须发挥自我动能,在跨越旧秩序的互动程序中,寻求共生的秩序。可以预见的,全球化的新时代即将来临,不可能只依靠科技能力、经济实力、军事威力、政治影响力所建立的权力运作,采取对他者施予心理威慑的方式来达成,而是必须依赖文化的力量,建构开放包容、创新共享的文化体系,这样才有可能在共生体系中跨越霸权思维和冷战思维,发挥文化的影响力与凝聚力。

作者简介:袁淑寒,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教师。

(摘自《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6期)